

一代哲人楊獻珍秘書著文論述

共和國三次哲學大論戰

GONGHEGUO SANCI ZHEXUE DA LUN ZHAN

蕭島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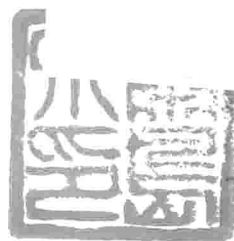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出版社

一代哲人楊獻珍秘書著文論述

共和國三次哲學大論戰

蕭島泉 著



香港文匯出版社

封面題字 李 銳
責任編輯 陳少華
文 金
美術設計 王 沖

書 名 共和國三次哲學大論戰
作 者 蕭島泉
出 版 香港文匯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2—4樓
電 話 (852) 28738053
傳 真 (852) 25526310
網 址 <http://www.wenweipublish.com>
電 郵 publish@wenweipo.com
印 刷 雅典美術印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印 數 1000冊
字 數 213千
定 價 港幣64.00元 人民幣 32.00元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374-306-8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論家教育家楊獻珍

薄一波

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

1996年2月1日薄一波為湖北鄖陽高等師範專科學校豎立的楊獻珍題字。



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理論家、教育家楊獻珍同志塑像（1996年7月13日在湖北省鄖陽高等師範專科學校落成、揭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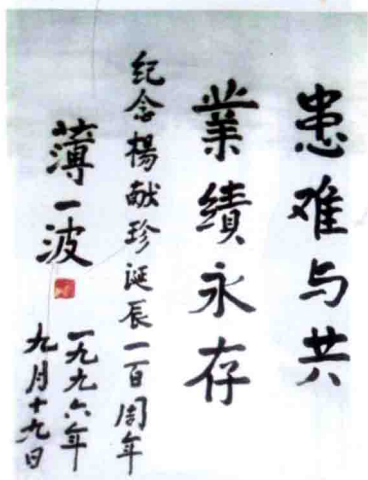
楊獻珍同志是忠誠的共產黨戰士，
我黨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教育家，
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何修權
一九九九年九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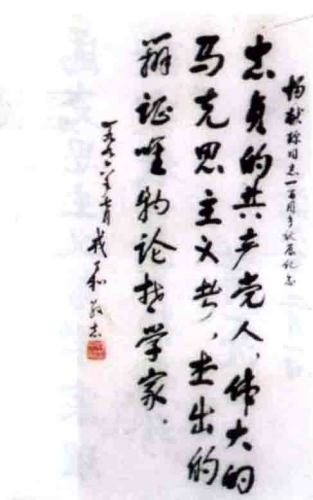
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同志為紀念楊獻珍誕辰100周年題詞

楊獻珍同志不屈不撓地
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
鬥，孜孜不倦地傳播馬克思主義
主義毛澤東思想，他的業績和
精神永垂不朽
楊獻珍同志誕辰一百周年
胡繩
一九九九年九月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同志為紀念楊獻珍誕辰100周年題詞（1996年9月19日）



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為紀念楊獻珍同志誕辰100周年題詞



原國家財政部副部長戎子中和同志為紀念楊獻珍誕辰100周年題詞（1996年7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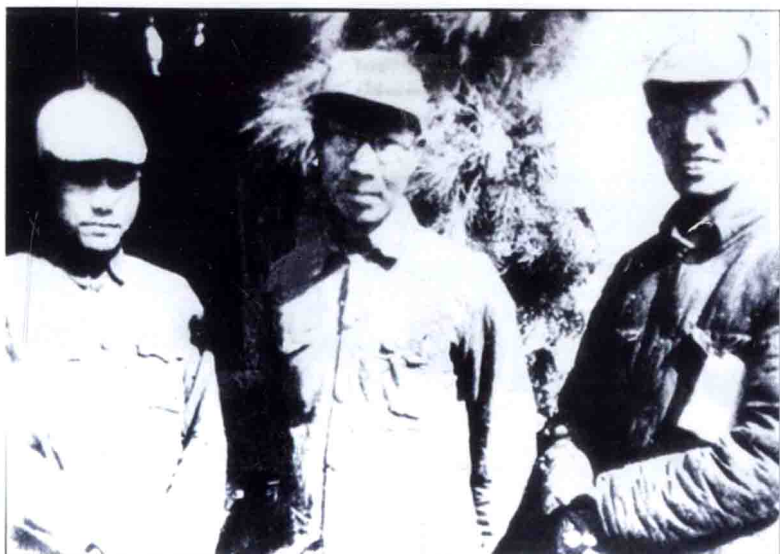
1962年4月15日，楊獻珍同志（前排左三）率中央高級黨校新疆班學員與毛澤東等中央負責同志合影。



1985年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楊獻珍（右一）等36位主動請求不再擔任中顧委委員的老同志。



1986年10月14日，楊獻珍在京出席紀念犧盟會成立50周年座談會。右起第一排依次為：原中共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王震、薄一波、楊獻珍、傅玉田。



抗日戰爭時期楊獻珍（中）在山西新軍抗敵決死三縱隊和戰友在一起。



1991年7月24日楊獻珍（左）95大壽時，薄一波（右）前往北京醫院向他賀壽。



1985年1月28日，楊獻珍（右二）與王震（左二）在一起。左一為北京軍區政治部秘書長哈斯，右一為作者蕭島泉。



1985年11月16日，楊獻珍（左一）會見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訪問教授韓·李克柔博士。



楊獻珍晚年仍筆耕不輟。這是他在書房中寫作，旁立者為作者。



2006年12月5日，李銳同志與作者就本書序言進行研討。

关于恩恩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就发生在中央党校。这个争论的焦点是：恩恩与存在同一性，是真心还是假命题。从恩恩与存在同一性，杨振宁说：真心命题，不同意恩恩与存在同一性，说：关于这个哲学命题是杨振宁之争。这个命题是不正确，存在同一性，是正确命题，存在同一性是恩恩与存在同一性，恩恩、存在、同一性之间的争论。

父恩寿写了两篇《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文章，在《奎招党刊》发表。这是六十年代初发表的，但一九八三年《父恩寿文集》第二卷出版，这“两篇”又全部删去发表。这是最奇怪的。

其恩奇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恩格斯自己则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最荒唐的哲学的胡说。”（《资本论》第四章）黑格尔的最荒唐的哲学的胡说，恩格斯怎么会把它肯定起来呢？

艾思奇说，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就是唯物论；不承认
 承认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就是唯心论就是怕鬼。（知
 以无知）列宁辩证说，思维和存在同一性是十足的胡
 言乱语，绝对的唯物主义^{艾思奇}（恩格斯的唯物论）
 艾思奇把巴札洛夫，把恩格斯的学说，降低为

序

李銳

《共和國三次哲學大論戰》的作者楊獻珍的秘書蕭島泉，為此書出版邀我作序，雖然我於哲學是外行，又未能細讀全書，仍勉強答應，是深感作者為當年這種論戰詳加記述，為歷史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大好事，值得向國人、尤其是從事理論研究的學人推介。

楊獻珍是我們一·二九這一代人的前輩，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他在草嵐子監獄中，就曾翻譯過多部馬克思著作，長期在獄中作紅色教員。我同老人有過一面之緣。那是1979年，我回京復職之後，或許是1980年，在中央黨校工作的老熟人張震寰來找我，說老人很想找我談談。原因就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由於他對「大躍進」運動和三面紅旗持不同看法，在黨校講壇上講過許多「反對派」的話，如「大躍進提出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幹，但在好多地方卻變成了胡想、胡說、胡幹」、「鋼鐵糧食都是硬東西，說假話是辦不到的。鋼鐵是一噸一噸煉出來的，糧食是一粒一粒長出來的」等等。於是在康生指使下，老人被批鬥了九個多月，降職罷官。在下放陝西、新疆，經過實地調查後，他更是意志不摧、銳氣未減，堅持自己的哲學觀點：「要好好學習唯物主義，客觀規律不是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在哲學上是意識自由論。」隨後在恢復講課後，老人繼續批判「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同時，他公開宣傳中國應當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批評那種害

怕資本主義而反對農民求富的慾望和行爲。通過那次長談，我才知道，文革時老人遭受牢獄之災長達八年。

今年是楊獻珍誕辰110週年，爲了追思老人對國家和歷史作出的貢獻，作者繼《一代哲人楊獻珍》出版之後，出版本書作爲姊妹篇，詳盡地記述了三次哲學大論戰的始末，即當事人楊獻珍同另一方論戰時雙方的主要立場和觀點。作者對我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發生的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極左思想統治下發生的。在意識形態方面，「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以及「一分爲二與合二而一」的哲學論戰，尤其令人驚心動魄、生死交惡。當年我在工業系統工作，1959年後我已成爲賤民，這三場論戰全然不知。

據作者的記述，第一次論戰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主題是：關於中國過渡時期「單一經濟基礎論與綜合經濟基礎論」。以楊獻珍爲代表的一方提出了綜合經濟基礎的理論，認爲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由五種經濟成份組成，即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份）、合作社經濟的半社會主義所有制、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個體農民所有制和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而另一方則提出了單一經濟基礎的理論，認爲過渡時期經濟基礎只能是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由於當年有違領導權威急於建設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綜合經濟基礎論當然受到圍攻和討伐。其後果是，到文革十年，我國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大家知道的，已經做了歷史的決議。

第二次論戰發生在五、六十年代，即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這一哲學命題。究竟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是黑格爾的語言，還是恩格斯的語言。以楊獻珍爲代表的一方認爲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命題是唯心主義，是黑格爾的語言，不是恩格斯的語言；而另一方則認爲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命題是唯物主義，是恩格斯的語言，而不是黑格爾的語言。由於這場論戰正處於

「大躍進」極度狂熱的歲月，極左路線需要哲學界爲之提供理論支持，因此，另一方就理所當然地爲極左路線賞識和青睞，從而成爲主流意識形態；而楊獻珍的一方，由於堅決反對大躍進中種種唯心主義的行爲，而受到極左路線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打擊和高壓。從而導致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形而上學空前猖獗，唯心主義空前盛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次「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戰，發生在1964年至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一翼以康生、陳伯達等一些哲學騙子、理論奴才爲首；另一翼爲以楊獻珍作代表的理論學術界人士。引起這場「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的論爭，是因爲楊老在中央黨校授課時講到了「合二而一」這一哲學命題。由於晚年毛澤東正以「一分爲二」作爲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因此他認爲「一分爲二」是辯證法，是普遍規律；並多次強調：「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不搞階級鬥爭，搞什麼哲學；搞哲學的人以爲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搞階級鬥爭，才搞哲學。」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就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可分割的聯繫，有聯繫，但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楊獻珍是真正做學問的哲學家，他從老子「合有無謂之元」的思想受到啓發，又從方以智的《東西均》一書中發現「合二而一」的提法，於是認爲蓋天地之萬物，既是「一分爲二」的，同時也是「合二而一」的。對立面的統一是辯證法的核心，任何事物都是由對立面或矛盾構成的，不是鐵板一塊的。「一分爲二」、「合二而一」、「二本於一」，辯證法不應當只講「一分爲二」，不講「合二而一」；辯證法只提「一分爲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鬥爭性，不要同一性。只講鬥爭，不講團結，是閹割了辯證法，是打人的理論。他還談到列寧在論述辯證法時，不僅講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而且同時也強調對立面的統一是辯證法的核心。而斯大林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所以在20年代搞肅反擴大化，給蘇聯造成了不

可彌補的損失。現在我們有些同志不瞭解，還是形而上學，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

由於楊獻珍的這一哲學觀點和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存在着嚴重分歧，因此論戰的結果當然以楊獻珍的失敗告終，不僅被撤消了中央黨校副校長、黨委委員的職務，而且被趕出黨校，分配到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當一個掛名的副所長。與此相反，康生、陳伯達等人則因整治楊獻珍有功，而更加受到賞識和垂青，及至文化大革命，陳伯達、康生分別擔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顧問。人們經過十年浩劫後方才恍然大悟，原來毛澤東發動這場驚天動地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運動，並非僅僅是針對楊獻珍，而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夜意識形態的一次預演、一次練兵。

蕭島泉給我的信中寫道：「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人類智慧的結晶，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人民自己的產物，是人民最精緻、最珍貴的、看不見的精髓。」這是古今中外哲學家的共識。不幸的是，我們的國家長期以來卻常常與此相悖。一些所謂哲學家們總是喜好迎合政治時局的需要，從哲學的角度去圖解、印證當政者發出的政策和指令，而不顧這些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客觀實際和歷史的發展規律。當政者則更是愉悅這些喪失理性、良知的所謂「哲學家」成為他們的奴婢，讓他們從哲學的角度為之鼓吹和呼應，以致使黨和國家蒙受無可挽回的損失，廣大人民群眾遭受不盡的痛苦和劫難。應當指出，哲學同政治二者是分屬兩個不同領域的事物，它們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其獨立性，哲學家決不可成為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成為御用哲學家。歷史的教訓是，必須確認哲學家 and 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不能因為他們的觀點和言論「不合己意」，就以行政手段進行壓制、打擊，無所不用其極。三次哲學大論戰血的教訓，證明當政者如何正確處理好政治和學術的關係，是一門值得很好研究的大工程，大學問。

作者長期擔任楊老的秘書。1992年楊老去世後，作者又受聘楊獻珍哲學思想研究所顧問、研究員。十幾年來，作者一直致力

於調查楊獻珍的生平事跡，探討研究其哲學思想，從而為其獨立的人格力量、旺盛的治學精神、罕見的理論勇氣所感動，終於又抱病完成了這部書稿。作者的這種情懷和毅力，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希望這本書的問世能幫助我們反思當代歷史的教訓，促進中國哲學思想領域的爭鳴和發展。

2006年11月20日

本文作者李銳係國內外知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著述甚豐。湖南平江人。1917年出生於北京；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二·九運動時，為武漢秘密學聯負責人；戰爭年代在湖南、延安和東北等地從事青年工作和新聞工作；全國解放後，曾先後擔任新湖南報社社長、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兼任毛澤東的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期被關在秦城監獄8年；1979年平反復職，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1982—1984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中共十二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被選為中顧委委員。

序

哲學與政治

侯 才

哲學與政治具有複雜的關係。它們分屬不同的領域，各自都具有自己的特殊規定性和一定的相對獨立性，因而彼此具有異質的性質，並且就此而論都有自己發展的內在邏輯，都是某種意義上的（雖然是「相對」意義上的）「自為存在」物。

同時，哲學與政治之間的聯繫也是顯而易見的。哲學不僅具有學術意義上的科學屬性，而且具有政治屬性，屬於意識形態的一部份。哲學的這種意識形態性質，是其價值性的突出表現。這就使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具有了同質的和親緣的性質。哲學與政治的這種同質性、親緣性，為政治家們把哲學隸屬於政治，乃至把哲學變成政治的婢女提供了某種根據和口實。

然而，歸根到底，同質性總是以異質性為前提。就認識秩序而言，人們必須予以充份關注的首先應是哲學與政治的差異和各自特點。哲學與政治的一個明顯的區別是，哲學作為人類把握自身和對象世界的一種特殊形式，具有超驗的特點，它總是訴諸和指向一般或普遍物。而政治作為擁有正當使用強力的特權來維護、規定和管理社會秩序的行為或技術，則具有具體的和現實的特點，它總是訴諸和指向當下和特殊物。更重要的是，哲學因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具有批判的本性。它在本性上是否定一切既有的、現存的東西的，也包括否定既有的、現存的政治。而政治

總是指向當下的存在，當下的利益，尋求現存的合理性及其論證。在此意義上，哲學與政治甚至是對立的。政治總是希冀哲學成為自己存在之合理性的論證工具。但是一切政治的現存都是有限的、暫時的。因此，即便哲學需要甚至有責任去為現存政治的合理性做論證和辯護，這也不是它的主要的政治功能，毋寧說，它的主要政治功能是對現存政治的審視、反省和批判。而這，恰恰也是現存政治的發展與進步所必需的。

哲學與政治相互關係的另一重要表現是兩者的相互依賴與相互影響。哲學依賴於政治。哲學只有通過政治、特別是政治權力，才有可能把自己變成現實。這點可以解釋為什麼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們往往希冀自己能夠成為王者之師。同時，政治也依賴於哲學。政治需要智慧，需要理性和德性（正義和善）的引導。而哲學對於政治來說不是別的，就是政治的理性和良心。政治有其內在邏輯，政治運行需要遵循、依據其內在邏輯。因此，政治需要訴諸理性，需要理性為之立法。以理性原則為指導的政治、與理性相結合的政治，可以稱為理性政治。而與政治相結合的理性則可稱為政治理性。政治不僅有其內在邏輯，還有其價值指向、價值主旨和價值基礎。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一旦問及政治家怎樣才能有望正確履行權力加於他的責任，就把我們帶入了倫理學問題之域（《學術與政治》）。政治總是指向一定的目的，總是為了實現一定的利益。權力也總是與責任相聯繫。政治權力本身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維護和滿足人們的利益、調節人們之間利益關係的工具。所以，政治不僅需要理性的頭腦，還需要德性的心臟。不僅需要理性為其立法，還需要價值為其定向。在此意義上，政治又是一種德性政治，需要以正義和善為基礎。而指導政治的德性、為政治定向的德性，則可稱政治德性。這樣，哲學對於政治來說在理性和德性兩個根本的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像人不能缺少頭腦與心臟。缺少理性的政治是無頭腦的政治，而缺少德性的政治則是無良心的政治，是比缺少理性的

政治還要糟糕的政治。

鑒於哲學與政治兩者的異質性和相互關聯，需要在哲學與政治之間保持一定的建設性的張力。這既為哲學的發展所必需，也更為政治的發展所必需。缺乏這種必要的張力，抑或消解這種必要的張力，必然導致政治對哲學權力的僭越，泯滅哲學的本性和功能，同時也使政治自身喪失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回顧和總結建國以來我國哲學歷史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事實上不僅在哲學與政治之間需要一定的必要的張力，在哲學自身內部的學術性與意識形態性之間也需要一定的必要的張力。在一定意義上，哲學自身內部的學術性與意識形態性之間的張力還是哲學與政治之間的張力賴以存在的前提。因為如果沒有哲學自身內部的學術性與意識形態性之間的張力，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只能有兩種結局：或者是一種絕對的同一，即哲學完全淪為政治的附庸，或者是一種絕對的對立，即哲學完全與政治脫節、分離。

保持哲學與政治之間的一定的必要的張力顯然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更是一個實踐問題。我國歷史上曾是一個封建大一統的國家，有着悠久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合一的傳統。在這種歷史條件和傳統之下，政治統攝和包容了哲學，哲學的意識形態性遮蔽和吞併了哲學的學術性。只是到了當代，隨着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哲學才開始愈益從政治專制主義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其學術性才開始愈益同其意識形態性相分離，獲得自己的一定的獨立地位。徹底改變這種舊有的歷史傳統及其遺存，顯然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政治家和哲學家們為之不斷做出努力。然而，當代中國哲學的希望在於斯，當代中國政治的希望也在於斯。

本書是楊獻珍同志的秘書蕭島泉教授在已過古稀之年抱着病體傾注心血而寫成的一部著作，它以作者獨特的體驗和視域，記錄和描述了一段值得人們回顧、深思和總結的歷史。作者是我的